

在“消解”传统的哲学本体论之后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 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特别是作为这种世界观核心的以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是现代哲学的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入了这种批判和消解的行列。与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代表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把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批判与消解变成对整个哲学世界观的批判与消解,把对以主客二分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变成对整个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而是通过批判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通过批判和消解以主客二分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本文剖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的哲学世界观与新的本体论,以及从这种新的本体论所引出的新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主客体辩证法;多元决定论

一

20世纪的哲学,是在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不断地“终结”、“治疗”、“消解”自身的历程中走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20世纪叱咤风云的哲学思潮,它不可能游离于这种时尚之外,实际上,它对哲学的探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彼岸世界”,不仅指“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而且包括一切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超历史”的或“非人”的存在,也就是说,不仅指束缚人的独立性的“神圣形象”,而且

包括束缚人的独立性的“非神圣形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矢志不渝地从事的一件事就是把哲学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它所要“消解”、“终结”、“治疗”的既有表征“神圣形象”的近代以前的哲学,更有以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以“非神圣形象”出现的近代哲学。阿多诺所提出的“解除概念的魔力乃是哲学的解毒剂”的命题,较有代表性地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消除对一切“超历史”的形而上学概念的崇拜的立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哲学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拯救自身。梅劳·庞蒂认为,哲学只有当它停留在抽象状态时才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要揭开其秘密,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又说道,

收稿日期:2003-03-29

作者简介:陈学明(1947-),男,上海崇明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哲学在掩盖现实的同时也反映着现实”，“哲学在作为孤立的东西被消灭的同时，实现了自己在现实中的存在”。正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能在现实中实现自身，所以哲学并不神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掌握和运用哲学。于是阿尔都塞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每个人并不是本能的哲学家，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哲学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把哲学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最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关于“哲学就是人学”的基本思想中。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这一思想最早的提出者和最系统的阐述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尽管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在认为“哲学就是人学”这一点上基本一致。科学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认为，传统哲学是一种无根据的“关于精神的科学”，是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而随着传统哲学的消解，哲学“剩下的只是对人的研究”，“哲学直接就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抛弃那种离开社会现实来论述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等等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空谈”，应把哲学的对象限定为“与人所变革了的自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人的活动”，他提出了“人是哲学中第一个主要问题”的命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提出，使哲学变成人学，实际上是要使哲学面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立了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他们指出，哲学家总是把日常生活拒之于研究的门外，始终认为日常生活是非哲学的、平庸的、没有意义的，只有摆脱掉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进行哲学思考。实际上与此相反，即应努力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研究的范畴，使之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改变哲学研究对象的做法，同时也从哲学角度改变了对日常生活的看法：用一种非平庸的观点来看平庸。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让日常生活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设计，是不能和超越哲学以及哲学的实现分开的”、“哲学的概念是自发地或是被人从外面引进地进入生活意识之中的”等，较完整地表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

常生活批判哲学理论。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实际上主要是对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的本体论的“消解”。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本体论性质，他们所说的非本体论就是非传统的本体论。在这方面以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的论述最详尽，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本体论”的命题。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如果哲学以探讨物质与精神谁是世界的本源作为第一要务，必然钻入死胡同。柯尔施就坚决反对用“关于‘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孰是世界的本源这样‘绝对的两极性’”去划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崇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充其量只是“用对叫做‘物质’的绝对去取代被叫做‘精神’的绝对罢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脱离了以主客二元分立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而达到了主客融合的境界，不能再像恩格斯和列宁那样重新将其拖回到争议唯物还是唯心的老路上去。柯尔施的这种反对传统本体论、反对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立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颇有代表性，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如葛兰西提出必须“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阿多诺更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反对“物质本体论上的首要性”，反对“崇拜所谓的‘客观的’物质世界”；萨特则认为坚持物质第一性的人因为把人的世界视为一种单纯的客观世界，从而“剥夺了人的主观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消解”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本体论，直接的目的是要人们重新审视对自然界、对所谓的客观世界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纯”客观地看待自然界，坚决否认有一个不随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他们强调要用实践的观点去看待自然，即认为自然物质是通过“历史的劳动”占有的，是“历史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而提出一系列命题表述这一思想。如列斐伏尔提

出“物质是一个 X”、“自然界本身是无动于衷的”，他之所以强调物质仅是一个“未知数”，根本目的是为了把物质变成一个纯粹的方法论结构；而他之所以又强调自然界本身是无动于衷的，更是为了说明只有人的活动才使自然界的存在具有意义。阿多诺所提出的相关命题是“客体只是一个术语上的伪装”，在他看来，因为客体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自存，从而充其量“只是一个术语上的伪装”。马尔库塞用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达不仅要在客观的意义上，更要在主观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的思想：“自然本身就是主体——客体”。梅劳·庞蒂的述命题则把其反对物质世界的“客观性”的思想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世界就是我们所知觉的那个东西”、“事物和世界是通过我的身体而给予我的”。当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人化物质世界”的思想做出经典表述的是葛兰西关于“客观等于历史的主观”的命题，他指出，“客观的”总是指“从人的角度客观的”，它正好确切地与“历史的主观”一拍即合。

正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消解”哲学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取消哲学，而只是意在通过批判束缚人的独立性的传统哲学使哲学真正面向现实生活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解”本体论也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取消本体论，而是旨在借助于对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建立一种能使主客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本体论。他们反对把存在的基础或本源归结于物质或精神，这并不妨碍他们自己对存在的基础和本源的探讨。卢卡奇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实体——主体”，但他仍然接受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命题，即也认为世界上有一个构成万物的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这一东西既是实体又是主体。这样，他一方面摒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又把人的意识，严格地说人的意识，作为“实体——主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人的意识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著名命题。葛兰西更是个研究本体论的专家，他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不能因为葛兰西如此反对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如此反对把“客观存在的物质”视为世界的本源，就认为他是从根本上反对“一元论”，完全取消涉及世界本源的问题。他反对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与此

同时主张“实践一元论”，认为真正构成世界本源的是“与某种有组织的历史化的‘物质’，与由人所变革的自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意义上的人的活动”。他所提出的“世界统一于实践”的命题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派别的本体论思想。霍克海默认为问题不在于对世界终极问题的解答是否是神学的、唯心主义的或是唯物主义的，而在于人们如何才能找到生活和生命之谜的答案。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形而上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唯有形而上学致力于探索存在的本质。他的“唯物主义即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命题，既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观，更反映了他从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中寻找存在的根基的基本立场。值得一提的是马尔库塞的本体论的情结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论述其爱欲论时也千方百计地要说明，他的爱欲论其实是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本质即爱欲的理论，他提出了“爱欲是一种新的存在本质”的命题。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从这种反对传统的以主客二分为标志的本体论，而把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视为新的存在本质的独特的本体论、存在论出发，引出了他们同样独特的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的精髓体现在卢卡奇的这一命题之中：“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其否认辩证法存在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之中，强调辩证法只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存在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之中。实质是认为辩证法发源于人类、发源于主体。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把辩证法理解成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它才是革命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又提出了两个命题：“对辩证的方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摒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把萨特论述辩证法的一系列命题串起来，则较完整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萨特说：“辩证的说明有其限度”，这是明确地反对辩证法的普遍意义，强调辩证法只适应于

一定的范围,他曾经指出其《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宗旨就是要说明辩证法是有其界限的。他还提出:“辩证关系不存在于自然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对自然的认识中”,他在这里强调了自然界本身不存在辩证法,也即在自然本身中不具有辩证关系,他通过分析人对自然的认识与自然本身的区别来论证这一点。他又强调:“当人们把辩证法输入自然界时,辩证法的可理解性顿时消失”,在他看来承认自然辩证法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即破坏辩证法的易懂性、明晰性和自明性。下述命题可以视为他从各个角度对辩证法所下的定义:“辩证法的特性其本身就是人类的特性”,这是强调辩证法的特性与人的特性的一致性,强调辩证法必须与人联系在一起;“辩证法是行动的活的逻辑”,这是把辩证法直接等同于人的实践;“辩证法必须来自于一个个的个人”,这是突出辩证法根源于个人的实践,要求把辩证法引导到它的根源上去,即引导到个人的实践上去;“个人实践体现了最纯粹的辩证法”,这是提出辩证法不是人以外的对象所固有的,而只是人所创造的,离开了个人就不可能有辩证法。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提出了许多给人深刻印象的含义相同的命题,如列斐伏尔说:“对于改变‘客观性’具有构造作用的人类实践,是辩证法的拱心石”;梅劳·庞蒂提出:“辩证法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痛苦的关系,无休止的交换的复原”、“辩证法无非是连续的统觉”、“辩证法就是对有后果的历史的持续阅读”;霍克海默强调:“辩证法是包括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前进过程”;阿多诺认为:“辩证法探索意识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力场”;施密特指出:“辩证法并不是世界的永恒法则,当人消失的时候,它也消失”、“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是自然构成要素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来说,辩证法只可能是一种历史方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主——客体辩证法就是总体性辩证法。在他们看来,辩证法的革命本质不在于人对外在的某种既定客观性的东西的遵循,而在于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对客体和对象的改造。这是一个变革现实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从而辩证法的本质既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和

具体统一,也是历史进程的总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客体辩证法与总体性原则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充分理由的。他们强调,重视主——客体辩证法就是重视总体性原则。卢卡奇提出:“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他强调辩证法观察历史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个总体,这一命题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萨特则指出:“辩证规律是社会被我们自己所总体化和我们自己被社会运动所总体化”,他把辩证法、实践和总体化视为是同一的。他还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辩证法即是整体化”,认为社会的整体化以个人的整体化为前提,而个人的整体化又体现于个人的实践、行为中。这种为人的实践、行为所实现的从个人到社会的整体化运动,正是辩证法的根本含义。对于总体性原则的推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倾向。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是论述这一点的,如卢卡奇指出:“辩证的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的方法”、“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卢卡奇在这里不仅指出了辩证法的总体观对把握现实的意义,而且强调了必须在辩证的、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来认识客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强调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的本质联系。总体性在他们那里首先是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即认为人不是作为片面的、孤立的东西而存在,而是作为历史的主客体的统一体而存在。正是由此出发,卢卡奇又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

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反对“反映论”。这是与他们在本体论上反对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立场相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既然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臆造出来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那么以这种对立为前提的“反映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承认“反映论”,是倒退到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的行

为。卢卡奇用以指责“反映论”的一个最经典的命题是：“‘反映论’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尽管这一命题只是重复了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话，但他显然是比李凯尔特更坚定地站在拒绝认识是反映这种观点的立场上提出这一命题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以柯尔施对“反映论”的批评最系统，他的相关著名命题是：“把思维看作是存在的反映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因为列宁主张“反映论”他就竭力指责列宁，他还这样说：“把反映论同马克思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列斐伏尔则提出：“再也没有比把‘事实’放在一边，而把它在人脑中的‘反映’放在另一边更违反辩证法了”。施密特认为，“认识的任务不是在像一道石墙似的围着人们的现实投降”，而“反映论”的要害就是要人们做出这样的“投降”。阿多诺指责“反映论”的语言则更决绝：“‘反映论’就是一种照相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反映论”，提倡实践论。在他们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把创造世界与认识世界分割开来，强调了认识世界的过程本身就是创造世界的过程，不把人仅仅视为反映者，而是视为实践者、创造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极其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卢卡奇到萨特均是如此。卢卡奇提出：“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造”，而萨特则指出：“辩证法只不过是实践”、“实践就是由于内在化而从客观到客观的过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突出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也就是突出劳动在认识中的功能，这样劳动又成了一个认识论的范畴。请看哈贝马斯的命题：“劳动不仅是人类学的范畴，同时是认识论范畴”，这一命题告诉人们：劳动既有人类学意义，又有认识论意义，社会理论实质是认识理论，认识理论也必须作为社会理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的这种双重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反对“反映论”，推崇实践论，说到底是为了突出认识主体的作用。他们在阐述认识论原理时如此激烈地抨击实证主义，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抹杀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他们强调，给人以规范性指导的理论并不是基于人的经验事实，而是依赖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充分信念，实证主义的要害就是

忽视人的主体性。为了突出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一些人致力于把人的兴趣重新引入认识论之中。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他明确地把兴趣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来重建一种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人们对他的命题耳熟能详：“兴趣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兴趣先于认识就像兴趣由于认识才得以实现一样”、“兴趣横亘在认识的基底之中”、“指导认识的兴趣是认识的不变的常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突出认识主体的作用还表现在其提倡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卢卡奇就通过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有关论述，反复说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科莱蒂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存在诸多争议，但在推崇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方面与卢卡奇完全一致，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从抽象到具体的过渡是思想适应于实在的唯一的办法”。另外还必须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方面既重视实践的作用，又重视理论的功能。这两者看起来相互矛盾，但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那里，重视实践的作用是为了突出主体的作用，而注重理论的功能同样是旨在推崇主体的地位。更何况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眼里，理论与实践本来就是一回事。对理论与实践一致性的阐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柯尔施早就反对用“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反作用于实践”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理论和实践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真正明确地把理论与实践等而视之的则是阿尔都塞，他所提出的“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命题广为流传。

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出了许多含义深刻的命题，用以表述其历史观。其中比较具有创意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否定上：

一是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强调历史只具有在人的能动作用支配下的趋向性，而不存在独

立于人之外的客观规律性。在他们看来,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客观规律的强调取代了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尊重,结果,历史过程就不再表现为主体统摄客体的过程。卢卡奇提出“人外在于自然而内在于社会”的命题就是要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一样,不存在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葛兰西则提出,“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是‘以白痴式的自我满足’去取代首创性”。马尔库塞把历史规律称为“历史律令”：“‘历史律令’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历史规律与客观性无缘。

二是否定历史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对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否定与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讲到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人们马上会想起萨特的著名命题:“决定论是没有的”,他把决定论的观念与上帝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决定论的观念都会通向上帝的观念。他还提出:“决定论无非是把人们的自由放入一种神秘的学识和一个官僚机器之中”。布洛赫的命题则表述得更清楚形象:“决定论就是要人们当乘客而不是司机”,他指出,如果世界的整个过程事先就被决定好了,那么人就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乘客,他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宣扬这种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领取一张驶向社会主义的火车票。

三是否定一元决定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持此立场。他坚决反对一元决定论,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改造不是从绝对精神一元论改造成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一元论,而是从一元论改造成多元论。他的相关著名命题是:“历史是由多元决定的”,即认为制约历史发展的不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对矛盾,而是由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在内的多种矛盾。正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是由多元决定的,从而他又提出:“不存在能被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唯一的线性时间的连续性”。他甚至还提出这样的命题:“‘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矛盾多元决定论的胜利”,他的意思是“十月革命”证实了矛盾是由多元决定的,如果坚持矛盾一元决定论,那么“十月革命”不可能爆发,更不可能成功。

四是反对经济基础决定论。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两种倾向的理论家的观点异

常一致。葛兰西就曾经提出了“上层建筑是决定一切的”命题,他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上层建筑不可能还原为经济基础,如果一定要说两种产生影响的话,那么上层建筑,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力量对经济基础的影响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模糊不清”,他的意思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要说还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是连两者的界限也已很难划分了。阿尔都塞则用其矛盾多元论来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他的相关命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又都是被决定的”。

六

在较详尽地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后,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其贡献之所在。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哲学在哲学上所做出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份。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而形成的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其对人类的负面效应暴露无遗。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特别是作为这种世界观的核心的以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是现代哲学的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负这一使命,他们加入了这种批判和消解的行列。纵观20世纪这一波澜壮阔的批判与消解的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力度与深度不逊于其他任何一种现代哲学思潮。但如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贡献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里,那真可谓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现代哲学思潮有许多不同之处,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构成了其主要的哲学建树。这主要表现在,它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等许多现代哲学思潮那样,把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批判与消解变成对整个哲学世界观的批判与消解,把对以主客二分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变成对整个本体论的批判与消解,从而走上了一条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道路。“西方马

克思主义”不是为了破而破,而是破中有立。他们通过批判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通过批判和消解以主客二分为主要标志的传统本体论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观和思维方式所展开的批判的激烈和尖锐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对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研究的意义,而注重于把这种研究由面向脱离现实的抽象的自然界或观念世界改变为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面向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上面我们全面剖析了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新的本体论,以及从这种新的本体论中引出来的新的辩证法、新的认识论和新的历史观,从中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够完善之处,甚至还有明显的错误成分,但其中包含着诸多真知灼见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把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出的可贵努力,特别是把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真知灼见与“后现代主义”等现代哲学思潮一对照,其超群出众、独步一时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2] 俞吾金,陈晓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3] 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4] 衣俊卿等.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5] Wright, Erick Olin, Andrew Levine & Elliot Sober.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2.
- [6] Aronson, Ronald. After Marxism. New York: Guilford. 1994.
- [7] Gottlieb, Rogers S. . An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Marxism. From Lukacs and Gramsci to Socialist - Femini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Agger, Ben. .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Goodyear Publishing Co. 1979.
- [9]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10] Arato, Andrew and Breines Paul. The Young Luka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Seabury. 1979.
- [11] Buckmoss, Susan. . The Origins of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12] Slater, Phil. .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Beyo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Ontology: Comments on the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of Western Marxism

CHEN Xuem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s to undertake the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al world outlook, especially of its core—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dualism. Western Marxist theorists also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mission.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som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lies in that Western Marxists have established a new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as well as a new ontology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ain target of Western Marxists is the modern metaphysical world outlook and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rather than the whole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and the ontology as a who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w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and the new ontology established by Western Marxism as well as the new dialectica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historical view derived from the new ontology.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philosophy, ontology, dialectics of subject and object, pluralistic determinism

(责任编辑:雨 桥)